

1933 年段祺瑞南下探析*

陳 明

[提 要] 1926 年臨時執政府倒台後,以段祺瑞為首的北洋勢力,仍是一股活躍力量。與其幕僚積極謀求復出政壇不同,段祺瑞早已萌生歸隱之意,在歷經數次出山受阻後更趨強烈。當蔣介石及南京國民政府面對九一八事變後日益嚴峻的民族危機,為揭破日本利用北洋殘餘力量在華北製造混亂局面的陰謀,在 1933 年 1 月邀請段祺瑞南下共謀禦侮時,段直接將其作為自己徹底脫離政治漩渦的機遇。段祺瑞南下,是其與蔣介石相互利用的產物。由於雙方根本意圖不同,段祺瑞南下數日裡,在一些方面積極配合蔣介石及國民政府,同時亦暗中與之進行巧妙博弈。結果段祺瑞徹底擺脫政治,南京方面實際收穫極少。日本在段祺瑞南下後加緊侵略步伐,華北危局隨之出現。

[關鍵詞] 段祺瑞南下 蔣介石 北洋殘餘勢力 1933 年 華北局勢

[中圖分類號] K261.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4) 03 - 0193 - 10

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及南京國民政府面對日本侵略勢頭的趨強,奉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將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紅軍視為“內敵”,瘋狂圍剿,同時對自己未能控制區域的地方實力派加以安撫,並向彼時散落華北的北洋殘餘勢力伸出橄欖枝。1933 年 1 月 21 日,有關前臨時執政段祺瑞應蔣介石邀請南下的新聞,突然遍載全國各大報紙顯著位置。隨後幾天,段祺瑞離津赴寧滬的具體行程及相關情況經各報披露,引起社會各界相當震動。就在時人揣測段祺瑞南下內幕及其後續時,出人意外的是,段並未與蔣介石在政治上實現攜手,而是徹底退出政壇,靜居避囂。

學界現有研究已梳理出 1933 年段祺瑞南下的簡要始末,但過程不甚詳盡,對其成因更是鮮有探討。^①如果考慮到段祺瑞在野北洋元老的這一特殊政治身份,以及 1933 年前後日本加緊侵華的態勢,顯然他的南下不僅僅是其個人生平中的重大事件,亦是觀察當時中國時局走向的重要窗口。本文擬從段祺瑞 1926 年下野後的處境及時局走向,還原促成 1933 年段祺瑞南下的相關史實,並力圖揭示其中內幕,以期推進相關研究。

一、1926 年段祺瑞下野後的處境

在段祺瑞一生中,曾有多次南下經歷與計劃,其中 1933 年的南下常被世人關注,且長期受政治

* 本文係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江浙基層治理的能力與實態研究(1927-1937)”(項目號:22JJD770037)的階段性成果。

因素影響，多從蔣介石一方加以解讀，^②很少回到具體的歷史語境，結合段一方的情況，進行相對客觀的討論。事實上，1933年1月段祺瑞南下，除了離不開中國時局突變下蔣介石方面所做的努力與敦促，也與段的歸隱之意有關。段祺瑞早在擔任臨時執政後期即已萌生退隱之意，在1926年下野後經歷多次出山努力失利，幕僚內部又紛爭不斷，對政治的態度更由觀望走向厭倦消極。

眾所周知，段祺瑞一度被視為袁世凱之後統一中國的不二人選，他為此也做過許多努力。不過，1920年直皖戰爭中的敗北，讓他遠離政壇四年多。至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他才利用馮無力控制政局以及國內外嚮往和平的時機，在馮玉祥、張作霖等實力派擁戴下出任臨時執政。他在上台之初，懷抱收拾時局、統一中國的夢想，也確實想有一番作為。^③然而，由於彼時他手無直接控制的軍隊，國民軍、奉系、西南實力派等均不聽其指揮，他只好通電呼籲各方停止軍事行動，組織召開善後會議，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謀求國家統一，仍無果而終。^④由於皖系內部也步調不一，形成以吳光新為首的“國舅派”和以段宏業為首的“太子派”，前者主張拉攏張作霖打擊馮玉祥，後者主張聯絡馮玉祥抑制張作霖。^⑤段祺瑞只好通過協調各方來維持地位。^⑥

至1925年底，由於馮玉祥、張作霖關係日益惡化，吳佩孚在武漢再起討伐奉張，連帶波及段祺瑞，使其處境更加惡化。國民軍本就對段祺瑞在財政上厚張薄馮頗為不滿，在郭松齡倒戈奉張後，直接派人對段加以監視，並拘捕其心腹曾毓雋等人。段夾在馮、吳、張之間，對政事“日益消極”。^⑦12月30日，段祺瑞因愛將徐樹錚遇刺身亡，決意改執政府為內閣制，將政務交由新組建的許世英內閣主持，表示“本人已無心問世，以後不談政治”。^⑧但此舉遭到其左右湯漪等人勸阻。段祺瑞只得撤回辭職原電，繼續謀求與馮、張等實力派合作。^⑨此後，段祺瑞又經歷了一段岌岌可危的時光。因三一八慘案發生，面對憤慨的民情以及國民軍與直系的威逼，段氏於1926年4月22日通電下野。此前，段祺瑞曾嘗試向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求助，並通過下罪己通電、和平令等來挽救局面，終無濟於事。^⑩

段祺瑞在下野後寓居天津，痛感前事，更對政治心生厭倦，日惟著棋念佛，且學作詩文。不過，他身邊的王揖唐、段宏業、吳光新、曾毓雋等仍對權力心懷渴望，希望借助實力派系之力擁段出山。他們先是試圖挑動奉系與吳佩孚間的矛盾，藉以推段出山協調，但張作霖不願過分得罪吳，使該計劃落空^⑪；繼而在北伐軍攻陷兩湖後，利用北洋勢力對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恐懼，謀求恢復段祺瑞政府，並與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閻錫山等連成一片。^⑫此計劃又因各方矛盾及利益糾葛未能實現。

段祺瑞看到幕僚們屢遭碰壁，不免有所氣餒，在1927年4月初接受舊部田中玉邀請，帶領家人及姚震等到大連療養。但段祺瑞左右有一部分人仍不甘心，並在一籌未展之時，接受岑春煊幕僚周培善的建議，決定促成段與溥儀合作。^⑬段祺瑞困於幕僚羈絆，經日本特務土肥原賢二牽線，赴天津與溥儀會晤。由於彼時溥儀並未放棄復辟帝制美夢，在會談時始終以高居其位的傲慢姿態對待段，而段祺瑞也放不下執政的傲氣，對是否與溥儀合作態度仍很矛盾，雙方不歡而散。^⑭

1928年春，北伐軍勢如破竹，奉系張作霖無法維持北京政權，北方秩序不穩。段祺瑞身邊幕僚王揖唐、段宏業等人又趁機通過陳覺生，勾結當時正試圖拉攏北洋在野實力派作為其傀儡代理人的土肥原賢二，希望促成段與日本合作。^⑮在王、段等人勸說下，段祺瑞多次派姚震拜訪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試圖借助當時日本調集到山東的軍隊，重返北京，組建臨時政府。但日本政府因“濟南慘案”發生受到國際輿論譴責，且認為段並無真正實力，對此未予支持。他只好轉而聯絡徐世昌、王士珍、曹錕、熊希齡等發起“和平運動”，呼籲南北停戰，通過和會解決彼此分歧。^⑯

6月北伐軍進入京津，宣告完成中國統一。段祺瑞看到自己曾經的學生蔣介石完成統一中國

後，拒絕張宗昌擁戴，隱居天津，並自撰“十勵八箴”，訓誡子弟，慢慢接受現實。^①當蔣介石因王揖唐、曾毓雋等人打著段祺瑞的旗號在天津、大連活動來函勸告時，段覆函表示，“津、連妨礙革命之舉，絕非所聞，亦非所樂聞”。^②此外，段還藉北伐軍進入豫直兩省後踐踏袁世凱園林及沒收其產業等舉動，函請蔣加以制止，並與其大論治國之道。^③

不過，隨後局勢的惡化，又讓局面發生變化。12月29日，張學良等通電宣布東北改旗易幟，服從南京國民政府，中國在形式上實現統一，但實際分裂局面並未結束。蔣介石與其他地方實力派因在地盤分配及軍隊編遣問題上分歧嚴重，相繼陷入混戰，最終導致1930年2月馮玉祥、閻錫山等聯合反對蔣介石的中原大戰。期間土肥原賢二趁機在華北大肆活動，希望吸收當地北洋殘餘勢力，製造亂局。土肥原找到段祺瑞，鑑於之前撮合段與溥儀合作未能成功，便以“三造共和”等為甘言，希望他出面聯合吳佩孚、閻錫山、韓復榘等，組織“北洋派大同盟”，在華北對抗國民黨。不過，韓復榘素不喜安福系，明確表示如果段能斷絕與安福系的關係，他可以對其表示擁護，並要求將來北京成立政府時，軍、政必須分開，段僅主持政治，軍事由吳負責。^④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由於蔣介石堅持對日實行不抵抗政策，國內倒蔣呼聲一片。1931年11月初，韓復榘和段祺瑞、閻錫山、吳佩孚的代表乘機在濟南舉行會議，決定推吳佩孚為抗日聯軍總司令，閻錫山、韓復榘為副司令，擁段祺瑞組織政府，以山東、山西為基地推倒張學良，並向蔣介石施壓。^⑤隨後土肥原也頻繁與段祺瑞接觸，答應由日本大倉洋行墊款五百萬元作為段的活動經費，促其出關在瀋陽組織傀儡政府。就在一切順利進行之時，意外發生了。由於段祺瑞在策劃“北洋派大同盟”時，考慮到韓復榘對安福系素有意見，吳佩孚與安福系間的矛盾亦未解決，始終瞞著安福系王揖唐等人。當此事被鮑觀澄洩露後，王揖唐、姚震等大為不滿，更利用天津《大公報》對段大加攻擊。土肥原看到段與其幕僚越鬧越僵，遂放棄利用段的想法。^⑥

如果說韓復榘、吳佩孚與安福系的矛盾是導致段無法與日本合作的原因，那麼幕僚內部的矛盾則導致段與陳炯明合作失敗。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息影政治多年的陳炯明派人四處活動，企圖聯絡津滬要人，尋機出山。陳曾派丘建軍、丘念台持親筆函赴天津拜謁段祺瑞，表達邀請段出山主持一切之意。段對此表示“我已年老，無能為力，最好請陳炯明速來主持，我當全力支持他一切大計”^⑦，言辭間流露出對參與政治的消極態度。即便如此，幕僚間的傾軋還是讓這一合作破局。

彼時段祺瑞身邊幕僚主要分為王揖唐派與曾毓雋派，彼此相互傾軋、爭利。1932年冬，陳炯明和日本人就組織華北政府進行倒蔣達成共識，只待段祺瑞加入。不過，隨著12月陳炯明因其母生病離津返港後，王派和曾派間的暗鬥直接讓段陳合作無果而終。據丘天羽回憶，曾毓雋在此次撮合段陳合作過程中出力最多，而王揖唐、段宏綱等深知曾陳交情深厚，加之段又聲稱一切大計交陳主持，早已暗中吃醋，常把其間內情洩露於外，在蔣介石方面利用巨額活動經費，及上海、淮海兩關監督為誘餌運動二人後，更是聯合段左右的有力人員“捏詞造謠，說土肥原已準備用對待溥儀的手段來對付段祺瑞”。段祺瑞信以為真，甚是慌張，急於走避。^⑧加之日本人策劃溥儀在東北建立偽“滿洲國”後，為解除華北對其安全構成的威脅，又造謠稱馮玉祥將北上聯合北方將領，敦促段出山。段祺瑞作為當時以“誓期消弭內戰，共禦外侮”為宗旨的廢止內戰大同盟會名譽委員之一，雖素以剛愎自用著稱，“然而平心而論，他的些微好處也就在剛愎，因為剛愎所以還有些骨氣”^⑨，且其年近七十，自然不願在民族、國家面臨危機之時，作繭自縛。^⑩

綜上可知，段祺瑞自任臨時執政後，因無力協調北洋各派力量，無法調和身邊幕僚內爭，即意欲歸隱，1926年下野後屢次努力復出又無果而終，愈發對政治事務感到厭倦，加之性格使然以及年近

古稀，急欲擺脫早已陷於內鬥的幕僚羈絆和各種政治漩渦，保全自己名節。正當段祺瑞不知所措時，蔣介石的南下邀約，為其提供了一個脫離政壇的機會。

二、蔣介石的南下邀約

蔣介石邀請段祺瑞南下，既為防止段叛國投日，又是其實施“安內攘外”政策、拉攏北方實力派、增強南京國民政府向心力的舉措之一。以往論者多注意前者，對後者關注較少。

1928年北伐結束後，蔣介石及南京政府面臨的首要問題，便是如何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贏得列強承認。為此，蔣在北伐剛結束即著手軍隊編遣，意圖削弱參與北伐的其他實力派，引起馮玉祥、李宗仁、閻錫山等不滿，進而導致新一輪內亂。待蔣介石採取合縱連橫策略，最終聯合張學良在1930年中原大戰中打敗黨內反對自己的軍事勢力後，外患內憂相逼而來：一方面，1931年日本先後製造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及九一八事變，東北局勢緊張，而且中共及其領導的紅軍也在各地呈燎原之勢；另一方面，1931年2月蔣介石直接將在約法問題上與自己發生分歧的胡漢民軟禁湯山，引起國民黨內反蔣勢力大集結，孫科、胡漢民、汪精衛等在5月牽頭組成廣州國民政府。此外，華北尚有大量北洋殘餘勢力，吳佩孚、陳炯明等人在積極尋機復出。

為了改變這種局面，蔣介石在1931年夏正式提出“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將在1929年10月首次提出“攘外”、“安內”主張時的“安內”對象加以調整，由原來包括中共及其領導的紅軍，但主要針對反蔣的地方實力派，調整為主要針對中共及其領導的紅軍，國民黨內外其他反對派退居其次。^②作為仍有相當威望的在野北洋元老，身處華北的段祺瑞自然成為蔣介石拉攏的重要對象。

事實上，蔣介石在北伐軍終結北洋力量控制下的北京政府之後，始終未放鬆對段祺瑞的關注和警惕。1928年7月5日，時在北京的蔣介石就因安福系打著段的旗號在天津、大連進行活動一事致函段，奉勸他“愛惜令名，善用勳望，以固革命之基，而奠共和之實”，“不終為奸邪宵小所誤”。^③蔣接到段否認自己參與其事的覆函後，又通過吳忠信在北京飯店約見段的侄子段宏綱，向其表示：“我亦保定陸軍學堂學生，段先生是我的老師”，託其向段表示慰問，緩和彼此關係。^④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王揖唐、段宏業等人積極勾結土肥原賢二以及北洋將士籌劃“北洋派大同盟”，讓南京方面及其支持者認為，段祺瑞既有前臨時執政之權威，又常居天津，恐終為華北局勢惡化的隱患，將其調離華北成為一個重要選項。鹽業銀行總經理、天津《大公報》社長吳鼎昌得知日本正在拉攏段祺瑞的消息後，即致電密友錢新之，建議由蔣介石邀請段南下。錢新之將此意轉告蔣^⑤，得蔣贊同^⑥。但此議因蔣介石於12月15日通電下野而擱置。至1932年初，南京方面鑑於華北局勢不穩，也為了防範日本利用段祺瑞等北洋力量在華北製造混亂，遂將段等人列入即將召開的國難會議名單，藉此讓其南下。而段此時尚未放棄與日本及陳炯明合作的想法，雖表示“國事至此，吾人惟有效越王勾踐刻苦忍辱，以求最後之勝利”^⑦，但拒絕南下。

1932年1月底，蔣介石和汪精衛攜手，再度上台。不久，一二八淞滬抗戰開始，上海駐軍面對日軍的進攻寡不敵眾。南京政府不僅遭到反蔣派攻擊，國內輿論也紛起批評，自然不願在華北問題上再授之以柄。在日本扶持溥儀在東北建立偽“滿洲國”，並以保障安全為由伺機將侵略矛頭伸入關內之時，南京政府也採取相應舉措：汪精衛在淞滬抗戰接近尾聲時與蔣介石商議，推段祺瑞為華北政務委員會主席，藉此安撫華北的北洋勢力；蔣介石亦不時向段諮詢外交政策及應付辦法。^⑧

本以召集人才討論禦侮、救災、綏靖各事宜為目的召開的國難會議，於4月12日閉幕。會議結果除宣言“中國在此嚴重局面之下，非集中全國才力，共作長期抵抗，無以圖存。而長期抵抗，必須

舉國一致”^③外，並未解決任何實際問題，令社會各界大失所望。對於南京國民政府而言，迫切需要一個契機來樹立中國朝野團結、一致對外的形象，以達到振奮民族精神之目的，並警示日本。而且，由於當時日本進攻熱河野心甚熾，行政院長汪精衛因對北平綏靖主任張學良藉抵抗之名以聚斂不滿憤而辭職，張學良為自證清白也在隨後請辭，由是蔣介石既要獨任中央又要負責華北事務。在內外交困的形勢下，邀請華北的段祺瑞等南下，共謀禦侮之策，對蔣及南京政府而言變得尤為迫切。

1933年1月2日，日本關東軍製造榆關事件，欲將戰火引入關內，華北局勢大為震動。日本浪人再次找到段祺瑞，尋求與其合作。但段主張日方只有先取消偽“滿洲國”，並恢復九一八事變以前的狀態，始可與之商談。^④無果後，日軍到處散播謠言，淆惑聽聞，同時安福系仍欲以段的旗號伺機有所作為。這使得段祺瑞深感環境喧囂惡劣，急欲避開津地以證自我清白。^⑤

同時，段祺瑞也公開表達共同禦侮的態度。1月12日，段祺瑞發表談話，否認自身參與政治活動，“現在國事有人負責，余以衰朽之身，除拜佛、參禪、圍棋外，不問他事。說余活動者，皆係渾人及另有作用者”，同時表示，“日本少壯軍人血脈憤張，狃於功利，我固橫遭蹂躪，彼亦決非福利。現在國聯已無制裁能力，我惟有全國上下，通力合作，持久抵抗，終必收最後之勝利”。^⑥因當時傳聞日方對段祺瑞、吳佩孚大肆誘惑，極力拉攏，上海市商會主席王曉籟與上海地方協會及交易所聯合會在1月18日分電二人，要求拒絕日人求見，並速發宣言表明態度，勿為日本人利用。^⑦對此，段祺瑞覆電明確表示自己的禦侮態度：“自念以身許國，不後於人。他事姑勿論，民五帝制，舉國若狂，端居屹然，諤諤自若，威武不能屈，寧卑辭所可誘耶？禦侮折衝，何間朝野，義所應為”。^⑧

段祺瑞上述言行，自然為蔣介石注意。蔣鑑於1月3日榆關失守後華北局勢的危急，認為“倭寇既得偽滿，其意本足，惟懼大戰將起，恐我乘勢報復，故急欲強我屈服”，“此後倭必以真面目來攻佔平津矣”，並有意北上親自與日一戰，“至於成敗利鈍則聽之。榆關之事不決，無與倭寇談話餘地。對平津二地，亟須設法使之安全”。^⑨蔣介石在思考運用各國公使干涉來保全平津的同時，也認為“倭有以主力攻凌源之勢，或料倭必攻熱河……彼猶想利用我對內部變動或漢奸，擾亂後方”。^⑩其中日本特務積極活動爭取的段祺瑞，也是關係當時平津局勢的一個重要因素，將其爭取到己方，至少可以戳破日本擾亂華北的陰謀，暫時保全華北。蔣看到段公開表示共同禦侮的態度，輿論導向亦漸趨明瞭，認為邀段南下的時機已到。時任北京交通銀行總行協理的錢新之，為四行準備庫事正好有赴華北一行之計劃，順道赴津不易被日偽懷疑，且錢與段有舊交，自願由交通銀行承擔段南下所需費用。^⑪在蔣介石看來，錢新之是代表自己與南京政府接洽段祺瑞南下的最合適人選。

1月19日，錢新之手持蔣介石的親筆簽名信來到天津，拜見段祺瑞。蔣在信中表示，國難當頭，平津環境惡劣，敦請段南下頤養，而且段作為民國元老，對於華北情形尤甚熟悉，可隨時與之商談國是，言辭可謂真摯感人，惟將南下一事“輕描淡寫，不著痕跡”。^⑫

對於蔣的南下邀請，段祺瑞鑑於當時風傳日本人將要採取對付溥儀的辦法劫持其成立偽政權，一邊表示“當此共赴國難之秋，政府既有整個之禦侮方針與辦法，無論朝野人士，自當一致起為後盾”，一邊委婉表示自己年事已高，無力再參與政治，“介石如認為我南下於國事有益，我隨時可以就道”。^⑬顯然，與蔣介石等人的政治意圖不同，段之所以答應南下，並非出於對南京政府的歸服，而是希望借此擺脫幕僚羈絆，脫離政治，保持晚節。

其時，段祺瑞身邊幕僚對於段氏南下的態度不盡相同，分為支持和反對兩派。前者包括許世英、吳光新、段宏綱、魏宗瀚等人。這些人或已得到南京國民政府的一定好處與利益，或已對段的依附性不強，此外也有尊重段個人想法的感情因素。如許世英早在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時便支

持蔣介石，南京政府也在1928年10月敦請許主持直魯兩省政務。^④許世英對段的南下十分積極。吳光新、段宏綱也認為段已年高體衰，不宜再參與政治活動。^⑤魏宗瀚則出於對段意願的尊重，認為南下“行止取決於老總”^⑥。曹汝霖、段宏業、王揖唐等則反對段祺瑞南下，仍舊希冀依靠段的威望重登政治舞台，甚至不惜借助日本之力，他們大多認為，“時局未必嚴重到非走不可的程度。而且，在租界裡一時也不會有什麼事”。^⑦王揖唐得知段祺瑞將要南下的消息後，即以其“事業都在北方成功，雖然現在家裡窮，將來總有機會出頭”為由加以勸阻。對此，段直言“我是中國人，決不做漢奸傀儡，就是你自己也應好好想想，不要對不起祖先、父母和子孫後代。我決計到南方去了，以後不要再來多說了”。^⑧即使在段抵達上海後，仍有不少安福系政客認為南下只是他一時韜光養晦之舉。^⑨段以愛國為由拒絕王的挽留，巧妙掩蓋自己南下的真實目的。

儘管身邊幕僚對其南下的態度兩歧，甚至出現力主南下的吳光新與反對離津的段宏業在吳家發生爭執，段祺瑞的態度卻十分堅決。為了不讓自己的行動被日本人和反對南下的幕僚阻撓，他更對錢新之表示，“明天即可同行”、“要走即快走”。^⑩而且，為了不讓自己南下發生意外，段祺瑞在正式動身前一直對具體行程嚴守秘密，知道的人並不多。

可以說，1933年段祺瑞的南下，是其與蔣介石相互利用的結果。段祺瑞希望通過南下擺脫幕僚羈絆，進而退出政壇，保全晚節；蔣介石則試圖利用段祺瑞南下，揭破各種圍繞段而產生的擾亂華北局勢陰謀，同時營造全國一致對外、共同禦侮的形象。由於雙方意圖不同，在段南下過程中彼此步調不可避免地出現不一致。

三、段祺瑞南下過程中的蔣段博弈

1933年1月20日，段祺瑞偕錢新之與舊屬吳光新、魏宗瀚及胞侄段宏綱等，乘坐津浦特快掛車南下。臨行前，段對外表示此行僅為私人出遊：“二小女在滬讀書，余思之切，故前往一看。適蔣派員希望過京時一談。蔣係余之學生，余當然可以見他談談。此外對國府任何要人，概不接談。余研究佛學多年，將往普陀一遊。”將自己南下的社交局限在私人關係內，“至於外交事件，吾國為求領土、主權之完整，應當抵抗，盼望全國上下，通力合作，以應付此艱危國難”。^⑪途經濟南時，段又對記者表示，“此次赴京，係因蔣先生屢想北來會晤未果，近又派錢君到津歡迎”，自己不能不去。^⑫

與此同時，隨行左右也就段南下的目的及行程，對外表示：“此行意義，為精誠團結，共赴國難表現，並可使日人謠言不攻自破。段到京，將與各要人晤面，貢獻一致對外大計，並將赴滬視女，約留兩周即北返”。^⑬這一表示極為周全，不僅尊重了段的個人意願，也顧及南京方面的訴求。

蔣介石及南京當局則將段祺瑞的南下作為其“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具體實踐，對此非常重視。蔣在得悉段南下具體行程的消息後即下通令，少將以上軍人著軍裝過江至浦口車站迎接，同時保定陸軍學校在寧校友及旅寧安徽同鄉會代表也集隊前往。當段祺瑞一行22日上午抵達浦口時，“渡江赴浦口車站迎接，計朱培德、楊傑、黃慕松、賀耀組、張群、許世英、陳儀、楊永泰、姚琮、胡承祜、邱煒，及段之故舊張我華、馬良，暨各軍軍事機關上中級官長、皖省旅京同鄉代表等，共千餘人”，迎接規模之宏大，一時罕見。值得注意的是，安徽旅寧同鄉會會員還特別攜帶寫有“歡迎‘三造共和’段老先生”、“歡迎抗日救國元老段老先生”字樣的白布橫額，直接表達對其的期待。^⑭

待段祺瑞下車後，蔣介石更以師生關係，親至下關碼頭迎接^⑮，並陪同其坐車進城前往下榻處勵志社，當晚還設宴招待，其後又與段談話一小時方才返邸。1月23日晨，剛從外地返回南京的代理行政院長宋子文立即赴勵志社訪段；國民政府要員林森、羅文幹、戴季陶、居正、張群等紛紛在本

日午前去拜訪⁵⁷；中午，又有“朱培德、何應欽、唐生智、楊傑……等一百三十四人”到勵志社為段洗塵。⁵⁸下午2時半，蔣介石還專門安排時間陪段謁陵，返回勵志社後先接見吳光新、魏宗瀚及段宏綱，繼至段居所與之暢談辛亥年要求共和通電以前之歷史。此舉是段所謂“三造共和”之一，改寫了中國國運，蔣專門提及此事，意在得到段對其挽救國運舉措的理解與支持。至5時半蔣才告辭離去。對段的回答，蔣甚為滿意，在日記中大歎“此老骨格與精神，求之當世不可多得也”。⁵⁹晚11時三刻，段一行乘夜快車赴滬，蔣介石又親自將其送至列車臥室。⁶⁰

蔣介石及南京政府試圖通過上述舉措，表示對段南下的重視，更欲將段的南下對外塑造成朝野團結、共同抗日的局面。從當時輿論反應看，此舉確實為蔣介石及南京政府贏得一些口碑，帶來一定正面影響。天津《大公報》評論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況如段之地位者！各國於國家有大事時，在野領袖，皆參大計。此次段雖為私人旅行，吾人信其與國事有益。更願段以外之在野要人，尤其軍界勳舊，皆能以段為範，多作南遊”。⁶¹天津《益世報》更提出希望：“我們此刻希望國中在野領袖，都認清此大前題。若吳佩孚，若馮玉祥等等，都應步段氏後塵，都應放棄政治主張，都應忘卻政治恩怨，都應與當權的黨及在位的人一致合作。”並“希望敵方浪人政客，因段氏南下，及早懺悔其詐誘欺騙手段。敵人此時亟應認識，中國為重視忠孝節義的國家，國民雖缺乏民族智慧的訓練，然人民絕非通敵賣國的人民”。⁶²《申江日報》不僅對蔣介石迎段之舉讚賞有加，認為“蔣委員長之於合肥，誼屬師生，執弟子禮頗恭，亦大有造益於國民之風範”，表示“芝老南來，日人側目，國民騰歡”，必能對日人“以華治華”政策予以沉重一擊。⁶³

段祺瑞看到蔣介石及南京政府方面種種逾出自己原本限定私人出遊、避免政治應酬的舉動，自然清楚其意圖，並努力與之劃清界線。他在與長江要塞司令楊傑的談話中再次表示，“此次南下，深不願受各方招待，在京可寄宿於申家巷十九號妹家”⁶⁴；繼而通過陪其南下的魏宗瀚對外公開聲明，“段公在津，每晨七時即起，誦經至午始息，膳後常與老友王雲風、李贊卿、曾〈毓〉雋、王揖唐、龔心湛等圍棋，並請楊僧若、王久齡等佛學名宿，共研佛學，數載於茲，未嘗間斷”。⁶⁵這些即是向蔣介石方面及外界表明段不問政治的態度。

當然，段祺瑞在尋求脫身的同時，亦順從蔣介石之意圖，對外發表關於時局的看法，緩和自己與蔣的關係。如段祺瑞在過濟南談話時即表示，“抗日問題物質固重要，而民意民氣尤要。”⁶⁶段對民意民氣的強調，恰合蔣介石之意。蔣在1933年1月16日中央政治學校講話時，便指出“現在的教育因過度強調科學和物質，忽略民族固有精神，乃使國家仍陷於危亡的境地”。⁶⁷再如，1月22日段祺瑞在勵志社被《中華日報》記者問及對抗日有何意見時，直接表示：“當此共赴國難之際，政府既有整個禦侮方針和辦法，無論朝野，皆應一致起為後援。瑞雖衰年，亦當勉從國人之後。”⁶⁸當24日抵達上海，有記者詢以華北問題時，段則答稱：“此次日本暴行，情不可感，理不可喻。但此種無理性之舉動，實予我一良好教訓。日本國土，較我小十六倍，原不足懼，惜十年來我國絕無準備，致為所乘耳。愛國之心，朝野一致，團結自助，尚有可為也。”⁶⁹所謂“朝野一致，團結自助”，也正是蔣介石及南京方面迫切希望看到的局面。

1月24日晨，段祺瑞攜吳光新、段宏綱、許世英等抵達上海，受到吳鐵城、李思浩、何其鞏、孫科及各團體等100餘人迎接。為避免出現在南京時政界人士紛來拜訪的局面，段在下車伊始，除對各報記者大談“中國應謀自助，不可依賴外來援助，希冀苟免。中國倘竭力準備抵抗，日本之侵略不足畏”外，再次表示南下係探視自己的妹妹及次女，自己年事衰老，在野多年，且久不閱報章，完全為一平民，不聞國事。⁷⁰到滬後，段除參加當天及次日上海黨政要人與機關的宴請，27日參加上海市

商會等團體宴請外，以年邁力衰為由，“靜居避囂，力避一切酬酢”。^⑦

與此同時，段祺瑞也竭力撇清自己與日本的聯繫。針對當時傳聞其主張中日直接交涉，段在1月28日接見路透社記者時絕對否認，表示“此類傳聞純屬子虛，無非日人故意造謠，淆亂外間視聽”，中日之間無妥協餘地，“除非日本先以東北交還中國”，際此空前未有之國難期間，“凡屬國民，均應盡其衛國禦侮之責任”，重申“此次晉京並無特殊任務，亦無政治上之關係”，自己雖與蔣晤談時發表過對於時局的意見，但能否見諸實施，當由政府決定。^⑧當上海各日文晚報在1月31日紛紛刊載電通社東京電，稱中俄日“滿”將實行提攜，實現“大亞細亞主義”，華方已得段祺瑞諒解，並在蔣介石、張學良面前力主此說，段在2月1日堅決否認，“非僅無提攜之主張，且所謂（大亞細亞主義）根本不知為何物，顯係日方造謠，以淆惑全世界人士之聽聞”。^⑨14日，日本駐華公使有吉明來滬拜訪段祺瑞。當時有人揣測此又為日本對其展開運動的先聲，為此段通過許世英對外聲明，“完全私人酬酢，絕未涉及政治”。^⑩在脫離幕僚羈絆之後，段毫無顧慮地拒絕了日方的拉攏。自此他始終隱居避囂，除1934年夏應蔣介石之邀往廬山避暑三月外，再未離開上海，直至1936年逝世。

結 語

總之，1933年1月段祺瑞南下，是他和蔣介石及南京政府方面相互利用的結果。一方面，段祺瑞在臨時執政後期，由於缺乏對北洋各派系及皖系內部矛盾的控制力，即已萌生歸隱之意，1926年下野後又因屢次復出無果，加之年事漸高，心力不足，對政治越發厭倦，急欲擺脫幕僚羈絆；另一方面，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侵略中國步伐日急，蔣介石及南京國民政府奉行不抵抗主義，造成內外交困的局面，特別是在日本製造榆關事件後，華北局勢日益不穩，蔣迫切希望通過邀請在華北尚有威望及影響力的段祺瑞南下，揭破日本圍繞其進行的種種陰謀，同時營造中國朝野一致對外、共謀禦侮的形象與局面。當作為蔣介石特使的錢新之向段祺瑞發出南下邀請時，段將此作為自己擺脫幕僚、脫離政壇的機會，欣然表示同意。

由於蔣介石與段祺瑞在南下問題上動機不同，雙方在段南下過程中的表現不盡一致。段和蔣在民族危機問題上，都秉持愛國態度和立場，對外尚能保持一致，這也是段南下得以實現的根本原因。但面對蔣介石和南京方面的政治拉攏，段祺瑞堅持自己南下只是私人出行。彼此博弈的結果，段祺瑞脫離政治漩渦的目的最終得以實現；對蔣介石而言，除了在段南下之時獲得外界輿論的一些稱譽外，實際產生的社會影響十分有限。由於蔣介石及南京國民政府仍舊採取“不抵抗”的消極抗日政策，以及寄託於國聯裁決的外交方針沒有實質性改變，民眾的反蔣呼聲依然高漲。

蔣介石對各地方實力派的懷柔舉措，也未因段祺瑞南下變得順利。其時馮玉祥及胡漢民、李宗仁、陳濟棠等，多對南京國民政府內部腐敗和蔣介石消極抗日態度相當不滿，對其仍持不信任立場。此外，吳佩孚面對蔣介石發出的南下邀請，仍選擇留在北平，很大程度上是因他對日主戰，與主和的蔣存在根本分歧。事實上，政治利益對立和政見矛盾，才是造成這些政治人物與蔣及南京政府離心離德的深層原因，不可能也不會因段的南下而輕易解決。

而且，在段祺瑞南下後，日本方面也未受到絲毫威懾，反而加快侵略步伐。1933年1月21日，即段祺瑞南下當天，日本外務大臣內田康哉在演說外交方針時直接宣稱，若國聯在滿洲問題上反對該國，日本可以退出該組織。關東軍司令官更在2月10日公布此前制定的《攻佔熱河計劃》，毫不掩飾地指出“攻佔熱河的目的，在於使熱河省真正成為滿洲國的領域，並為消滅擾亂滿洲國的禍根即華北張學良勢力，創造條件，進而確立滿洲國的基礎”。^⑪3月27日，日本宣告正式退出國聯，徹底

向世界昭示其侵略中國的野心。5月6日,日本參謀本部將此前制訂的《華北方面緊急處理方案》下達給上海武官、平津特務機關並通報關東軍,要求各方進一步強化壓制方針,即沿長城線對中國軍隊進行反復、徹底打擊,並繼續進行華北內變、策應工作。其後漢奸郝鵬、石友三等在奉天特務機關長板垣征四郎指使下,在天津策動暴亂。日軍的侵略野心日趨膨脹,華北局勢更加不穩。

①論著方面,黃征等《段祺瑞與皖系軍閥》(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李慶東《段祺瑞幕府與幕僚》(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0年)、彭秀良《段祺瑞傳》(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周俊旗等《段祺瑞真傳》(瀋陽:遼寧古籍出版社,1997年)、胡曉《段祺瑞年譜》(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等,對段南下經過做了或詳或略敘述;論文方面,朱更勇《段祺瑞的最後十年》(貴陽:《文史天地》,2008年第8期)、秋水《段祺瑞晚年的民族氣節》(太原:《文史月刊》,2009年第2期)、宋鳳英《“親日軍閥”段祺瑞晚年的抗日情結》(貴陽:《文史天地》,2011年第3期)、張耀傑《晚年段祺瑞的政治投機》(廣州:《同舟共進》,2016年第3期)等,對段南下經過、原因及相關細節有所論述。目前研究唯對錢新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較為清晰,詳見邢建榕《1933年段祺瑞南下內幕》(合肥:《江淮文史》,2009年第4期)及《錢新之函電所見段祺瑞南下經過》(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檔案史料研究》第10輯,上海:三聯書店,2011年,第142~147頁)。

②參見前引張耀傑、邢建榕等人的研究。

③《段祺瑞抵京之盛況》,上海:《申報》,1924年11月28日。

④詳見楊天宏:《北洋政府和平統一中國的嘗試——善後會議再研究》,北京:《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5期。

⑤鄧漢祥:《我所了解的段祺瑞》,《文史資料選輯》第26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第135頁。

⑥⑪③④⑧黃征、陳長河、馬烈:《段祺瑞與皖系軍閥》,第269頁;第302頁;第311頁;第313頁。

⑦榮孟源、章伯鋒主編:《近代稗海》第5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88頁。

⑧《段祺瑞準備下野》,上海:《時報》,1926年1月8日。

⑨《段祺瑞致國務院各部院會署及各省軍民長官電望各建謨言迅定國是即釋重負》(1926年1月9日),台

北:“國史館”藏閻錫山史料,116-010101-0027-022。

⑩孫曜編:《中華民國史料》,上海:文明書局,1929年,第743頁;《段執政罪己之通電》,瀋陽:《盛京時報》,1926年4月19日。

⑫⑬⑭⑮⑯胡曉:《段祺瑞年譜》,第250頁;第252頁;第252~253頁;第255~256頁。

⑰⑱⑲許念暉:《土肥原策動“北洋派大同盟”的內幕》,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29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146頁;第147頁;第153~155頁。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我所知道的段祺瑞》,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8年,第113頁;第204頁;第167頁;第150頁;第112頁;第173頁。

㉞《段祺瑞之逸興閒情》,天津:《益世報》,1928年4月5日。

㉟上海市檔案館編:《民國名人手跡》,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6年,第147~150頁。

㊱㊲丘健軍:《“九一八”後陳炯明勾結段祺瑞聯日倒蔣的秘密》,《文史資料選輯》第99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4年,第119~120頁;第121~122頁。

㊳《懺悔(獨鶴)》,哈爾濱:《遠東報》,1920年12月18日。

㊵《段祺瑞聞謠電》,上海:《新聞報》,1932年11月10日。

㊷詳見黃道炫:《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方針研究》,北京:《抗日戰爭研究》,2000年第2期。

㊹《蔣中正致段祺瑞函勸勿再受人利用》(1928年7月5日),台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002-060100-00012-005。

㊻胡曉:《段祺瑞年譜》,第253頁。按:1928年7月20~21日,吳忠信與蔣介石在北京飯店有活動。參見吳忠信原著,王文隆主編:《吳忠信日記(1926~1929)》,台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香港:開源書局,2020年,第

122 頁。

③⑩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檔案史料研究》第 10 輯，第 142~143 頁。

③②《段祺瑞談國難會議》，天津：《大公報》，1932 年 1 月 23 日。

③③《段祺瑞致蔣介石函略述當前外交政策及應付辦法與近況之推測》（1932 年 4 月 3 日），台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002-080200-00622-010。

③④《國難會議宣言》，上海：《申報》，1932 年 4 月 15 日。

③⑥《段祺瑞南下》，上海：《大中國週報》，第 1 卷第 3 期（1933 年 1 月 23 日），第 17 頁。

③⑦《段祺瑞否認政治活動》，上海：《申報》，1933 年 1 月 13 日。

③⑧《段祺瑞覆市商會電》，上海：《申報》，1933 年 1 月 21 日。

③⑨《段祺瑞昨晚南下》，上海：《民報》，1933 年 1 月 21 日。

④④⑤⑤⑤⑨《蔣介石日記》，1933 年 1 月 4~5 日；1933 年 1 月 16 日；1933 年 1 月 22 日；1933 年 1 月 23 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檔案館藏。

④②邢建榕：《1933 年段祺瑞南下內幕》，合肥：《江淮文史》，2009 年第 4 期。

④③⑤①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憶》，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 年，第 310 頁。

④④《段祺瑞今晨蒞滬》，上海：《申報》，1933 年 1 月 24 日；《我所知道的段祺瑞》，第 168 頁。

④⑤安徽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東至縣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許世英》，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9 年，第 39 頁。

⑤⑩黃郛著，任育德主編：《黃郛日記（1933~1934）》，香港：開源書局，2019 年，第 7 頁。

⑤②《段祺瑞應蔣邀南下》，上海：《申報》，1933 年 1 月 21 日。

⑤③《段祺瑞昨過濟徐南下》，上海：《申報》，1933 年 1 月 22 日。

⑤④《段祺瑞昨南下》，上海：《時事新報》，1933 年 1 月 21 日。

⑤⑤《千餘人熱烈歡迎段祺瑞抵京》，南京：《新民報》，1933 年 1 月 23 日。

⑤⑦《段昨在京備受歡迎》，北京：《華北日報》，1933 年 1

月 24 日。

⑤⑧《段昨夜離京赴滬》，天津：《大公報》，1933 年 1 月 24 日。

⑥⑦⑦⑦《段祺瑞昨晨抵滬》，南京：《中央日報》，1933 年 1 月 25 日。

⑥①《社評：送段芝泉先生南行》，天津：《大公報》，1933 年 1 月 21 日。

⑥②《社論：段祺瑞赴京》，天津：《益世報》，1933 年 1 月 21 日。

⑥③《社論：望政府無負於段芝老之南下》，上海：《申江日報》，1933 年 1 月 25 日。

⑥④《段祺瑞昨自平抵京》，上海：《申報》，1933 年 1 月 23 日。

⑥⑤《段祺瑞抵京》，南京：《新民報》，1933 年 1 月 23 日。

⑥⑥《段祺瑞昨晚過徐州過濟晤韓復榘》，天津：《庸報》，1933 年 1 月 22 日。

⑥⑦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 4 冊，台北：“國史館”、中正紀念堂管理處、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2015 年，第 7~8 頁。

⑥⑧《迴避日方陰謀撥弄段祺瑞抵京》，上海：《中華日報》，1933 年 1 月 23 日。

⑥⑨《盛大歡迎中段祺瑞昨晨抵滬》，上海：《民報》，1933 年 1 月 25 日。

⑦①《段祺瑞在滬之酬酢》，上海：《晨報》，1933 年 1 月 30 日。

⑦②《段祺瑞否認主張直接交涉》，南京：《中央日報》，1933 年 1 月 29 日。

⑦③《段力闢日人造謠》，南京：《中央日報》，1933 年 2 月 2 日。

⑦④《日使突訪晤段祺瑞》，上海：《申報》，1933 年 2 月 16 日。

⑦⑤日本政府參謀部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稿·譯稿·滿洲事變作戰經過概要》第 2 卷，田琪之譯，宋紹柏校，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第 71 頁。

作者簡介：陳明，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博士。南京 210023

[責任編輯 陳志雄]